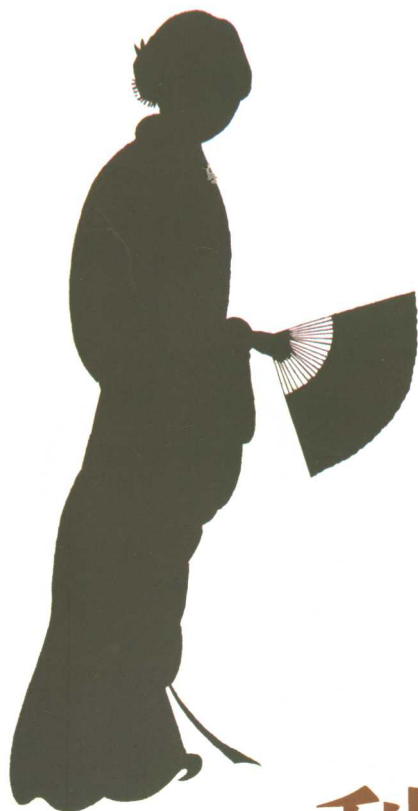


WENXUE XIANGXIANG YU WENHUA LIY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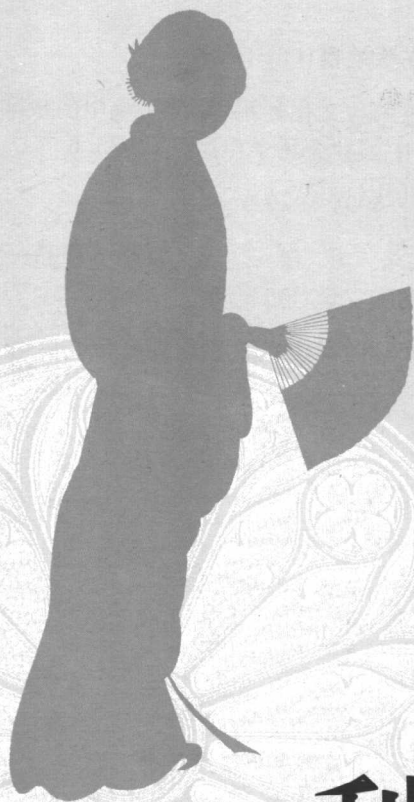
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

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姜智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WENXUE XIANGXIANG YU WENHUA LIYONG



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

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姜智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姜智芹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6

ISBN 7-5004-5079-6

I. 文… II. 姜… III. 文学—作品—描写—文学
研究—英国 IV. I56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9953 号

责任编辑 田改伟 冯 斌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010—6403153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盛华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杨正润

姜智芹女士的《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即将出版了，我作为书稿最初的读者，同她一道分享着欣喜。

这部论著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的范围。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一些法国和德国学者首倡形象学，近十余年来，国内学者相继呼应，多有论著问世，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新热点，颇为学界所瞩目。不过如果比较一下这些论著，就可以发现，关于形象学，无论其对象、范畴或是原理、方法，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以至差异甚大。对于一门新兴的学科而言，这种现象自然难免。这也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对于研究者，特别青年学子，可能使他们感到困难和茫然；另一方面，这就提供了一个十分广阔的空间，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理解、兴趣和专长探索前进，去丰富这一学科的内容。在一个思想和学术都日益多元化的时代，这是必然出现的局面。

智芹博士兴趣广泛而又目光敏锐，颇富学术悟性，她是较早进入了形象学领域的青年学者之一。她的这部专著论析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涉及这一课题，智芹并非第一人，但是智芹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中英文化交流源远流长，13 世纪的英国文献中就已经出现

最早的中国形象，其后七百多年中，中国形象在英国文化典籍中不断出现，或正或邪，五光十色。智芹自然不可能把所有的资料都收罗齐全，但是那些最重要的、最富代表性的作品大多进入了她的视野，成为她考察的对象，关于“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这样一个课题，智芹做出了迄今为止也许是最完整的一种研究。

智芹在自己的研究中十分注意资料的收集，依靠她出色的英语基础，她大量查阅了原典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这是完成本项研究所必需的，但是智芹并不满足于资料的收集和清理，而且显示出一种非常可贵的、自觉的理论意识。形象学大师、法国的巴柔教授说过：“他者形象不可避免地同样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自身、对我自己所处空间的补充和外延”，这种“否定”、“补充”和“外延”的发现与探究才是形象学的核心。为了更深入地发现英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内涵及其意义变化的底蕴，智芹广泛吸取和借鉴当代西方学术的成果，如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中有用的方法和概念，她更新了命题、扩展了视野，无论是论析英国作家怎样借助中国形象寻找自己“想象”的空间，或者探讨他们如何对中国形象作正面或负面的“利用”的时候，她都力图进入深度探析，其结论也给读者以更多的启迪。本书的最后，智芹把她对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认知，上升到文化差异、误读与交流的层面予以总结，她的结论可以深化形象学研究的内容。

智芹在山东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以后，来到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这部著作就是她这一期间的学术成果之一。在出站报告中，有关专家对她的研究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为联系导师，她治学的勤奋和认真、她付出的劳动和牺牲，我是深有

所知的。智芹对比较文学和形象学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我坚信，她不会满足，她一定会继续开拓进取，作出更大的成绩。

2005 年 5 月于秦淮河畔

目 录

序	(杨正润) (1)
---------	-----------

导言	(1)
----------	-----

第一章 比较文学形象学意义上的异国形象	(10)
---------------------------	------

一 定义、范畴与方法论	(10)
-------------------	------

二 投射性、互动性与跨学科性	(15)
----------------------	------

三 中英数百年文化交流概览	(23)
---------------------	------

四 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概述	(34)
------------------------	------

第二章 想象的乌托邦和异域之美	(38)
-----------------------	------

一 想象在异国形象塑造中的独特作用	(38)
-------------------------	------

二 《曼德维尔游记》中的传奇中国	(42)
------------------------	------

三 英国现实生活里的“中国风”	(48)
-----------------------	------

四 《忽必烈汗》残篇里的梦幻中国	(61)
------------------------	------

五 “古瓷”与“烤猪”上的怀旧中国	(73)
-------------------------	------

六 人类永恒的梦乡——香格里拉	(82)
-----------------------	------

七 西方世界的折射——卡内蒂的《迷惘》	(91)
---------------------------	------

第三章 质疑与构建：进步与审美视野中的他者	(105)
一 英国文人的中国揄扬.....	(108)
二 伯顿：治疗“忧郁”的灵丹妙药.....	(117)
三 《赵氏孤儿》改编里的政治映射.....	(124)
四 《世界公民》中的英国批评.....	(131)
五 兰陀：中国皇帝是东方的明珠.....	(141)
六 卡莱尔：文人英雄的成功政治.....	(147)
七 迪金森：现代审美视野中的乌托邦中国.....	(153)
八 罗素：拯救西方文明的东方之光.....	(162)
第四章 维护与整合：停滞与恐怖意识中的他者	(173)
一 “中国热”的退潮和中国形象的改变.....	(173)
二 笛福：中国的严厉批评者.....	(189)
三 德·昆西：恐怖与停滞的中国.....	(201)
四 毛姆东方主义的傲慢与偏见.....	(210)
五 罗默的“黄祸论”幽灵付满楚.....	(222)
第五章 文化的差异、误读与交流	(234)
一 文化差异、文化屏障与文化交流.....	(234)
二 文化交流与形象误读.....	(240)
三 文化交流的若干通则.....	(248)
主要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67)

导 言

多元文化碰撞和互相渗透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人类文化交流中，西风东渐和东风西渐是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但在研究实践中，前者是中国学者谈论较多的话题，后者无论是从事研究的人数，还是所取得的成果，相对来说要少得多，这与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不相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以前大多从自身出发来研究中国的发展与演变，着眼于西方文化输入对中国社会进程、文化发展的激发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多元文化格局的强调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将东风西渐的研究课题摆在我们面前。世界历史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不仅西方塑造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形象也作为文化“他者”，参与塑造了西方文化的“自我”，并对西方文明的进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一点通过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本书以英国的中国形象为个案，从一个棱面探讨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英国文学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可从文学想象和文化利用两个大的方面来考察。文学想象主要偏重于文学的审美功能，遥远的东方可以给英国的诗人、作家提供一个驰骋想象力的空间，营造出一片美的圣苑，或流露一种向往，或表达一份情感，从而带给

人审美的愉悦。这一点在 14 世纪的《曼德维尔游记》、17、18 世纪英国现实生活中对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园林艺术的热衷、19 世纪柯勒律治的残诗《忽必烈汗》、散文家兰姆对中国的“古瓷”和“烤猪”所做的玲珑剔透的描绘，以及 20 世纪詹姆士·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对“香格里拉”的创造中，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从文化利用上来看，英国对中国文化的利用大体上可分为正面和负面两种。正面利用多是用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来质疑现存秩序，提出构建一种新秩序的设想。从历史上看主要是两个时期，一是 19 世纪以前的英国文人及 19 世纪的某些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官考试制度、哲人治国等方面的颂扬和借鉴，威廉·坦普尔（1628—1699）、罗伯特·伯顿（1577—1640，《忧郁的解剖》）、奥利弗·哥尔斯密（1730—1774，《世界公民》）、沃尔特·塞维奇·兰陀（1775—1864，《中国皇帝与清蒂之间想象的对话》）、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雄和英雄崇拜》）等人都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二是 20 世纪初忧思西方文明的英国知识分子对东方智慧的希冀和畅想，如文学家洛斯·迪金森（1862—1932，《约翰中国佬的来信》）、哲学家、思想家罗素（1872—1970，《中国问题》）等人对中国之光的寻求和探索。负面利用主要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某些英国作家，此时强大的英国倾向于用丑化的中国形象来彰显自我，凸显霸气，维护与整合英国自身的秩序，这方面表现突出的主要有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毛姆（1874—1965）、萨克斯·罗默（1883—1959）等人，此外还有 18 世纪初的丹尼尔·笛福（1660—1731）。当然，以上三个方面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文学想象几乎在所有塑造中国形象的英国作家身上都有体现，但在我们划归为想象一类的作家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另一方面，这类作家身上也有些人表现出文化利用的倾向，只不过不那么突出。此外，

那些对中国形象进行正面利用的英国作家也不排除其有过不利于中国的言辞，反过来亦然。因此，我们这里的划分是取其主导倾向，不应绝对地来理解。

一国文学中对于异国形象的表述，重要的不是追寻一个文化事实，而是发掘其可利用的价值。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由于语言、习俗、心理结构等不同，难免会产生误解，先在的民族文化心理与经验结构作为先在视野，总是制约着双方的理解与阐释活动。重要的是文化的互为利用，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应该说是文化交流的一个潜意识动机。英国的中国形象，潜藏进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当中，不过，文学艺术中的中国形象更能说明英国文化潜意识中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中国曾一度是英国自我批判与自我改造的超越力量。14 世纪英国文学中描写中国的《曼德维尔游记》，与《马可·波罗游记》相互引证、相互参照，共同创造出一个繁华富丽、政治稳定、宗教宽容、象征着世俗乐园的“契丹形象”，而当时的英国在充满财富与权力象征意味的“契丹形象”中，发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世俗精神，它激发了英国社会中被基督教文化所压抑的世俗欲望，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对城市发展、自由贸易、统一市场的向往。中国是财富和君权的象征，也是英国人向往的极乐福地，他们在羡慕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饶、城池众多、道路纵横的同时，也在体验自身的缺憾、压抑与不满，并表达自己的欲望和想象。

16、17 世纪，随着大批传教士来华，再加上西欧海外探险者、扩张者与中国的接触，西方的中国观有了明显的改变，其注意力从单纯的地理概念和对中国物质财富的渲染，转向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即从器物层面发展到制度和思想层面。在这一背景下，英国一方面有现实生活里渐起的“中国风”，另一方面有知识阶层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儒家思想等的全面考察和利用，许多

文人津津乐道中国的司法制度、文官考试制度，赞叹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推崇中国的语言与中国人的勤劳。中国成为一种改造英国社会的动力，扮演着精英文化中的某种社会理想。英国需要一个改革和超越自我的榜样，遥远的中国恰到好处地扮演了这一角色。英国开始在不同的文明层次上利用中国。

18 世纪，虽然英国文人的“中国热”出现退潮迹象，但中国形象在整个欧洲却表现得更为丰满、真实、有力，中国是一个样板，一个楷模。启蒙哲学家将中国当作欧洲的榜样，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所提供的中国合乎理性的道德政治与贤明智慧的康熙皇帝。中国形象不断被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平民政治。

19 世纪，工业文明的凯歌行进使西方文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大幅度的逆转。19 世纪的大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世界一直感兴趣用西方文化来拯救东方，以殖民心态对待中国人民。这一时期大部分英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丑陋的、邪恶的、堕落的，他们带着傲慢与偏见丑化中国人，扭曲中国形象，英国对中国形象的利用倾向于负面的对衬，中国形象从英国的社会期望中消失了。到了 19 世纪末期，由于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类精神空间的侵蚀，西方一些理性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冷静的思考，基于对自身文明的忧虑和批判，一度遭蔑视的中国形象开始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向往之地，悄然进入审美期望之中。在社会期望中，英国试图将中国形象从幻想引渡到现实，作为质疑本国现实的力量；而在审美期望中则极力让中国形象沉入幻想，试图借以述说自己对往昔的缅怀，对现实的批判。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在《关于“异”的研究》中分析

道，西方关注异国的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西方人想寻找一个与自己的社会不同的异域，异域是他们的乌托邦或精神避难所；其二，西方人一直在寻找一种原始社会，他们想通过对这个原始社会的描绘，来批评自己的社会。历史上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样的一个“原始社会”。启蒙时期，西方人就已经持有亚洲代表人类童年时代的观点，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他认为世界精神是由东方发展到西方的，亚洲代表着过去，西方人可以通过对亚洲的研究把历史唤回到他们的记忆中。亚洲甚至还保存着欧洲所失去的一切，因此顾彬说“西方人把视线移向东方的目的是想通过东方这个‘异’来克服他们自身的异化”^①，从而回归到“本真”状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社会出现的现代主义思潮，表现为社会危机意识以及从美学和哲学上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现代主义者怀疑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核心——理性与进步，怀疑他们一个多世纪以来信心百倍地建设的现代文明的人性基础，他们开始在西方文明之外、现代文明之前，在古老的东方，寻找启示与救赎，中国是这个文化东方的重要代表。中国形象作为前现代想象中的“他者”，在时间上代表着美好的过去，在空间上代表着美好的东方，表现出现代主义思潮中那种怀乡恋旧的寄托与精神和谐的向往。英国作家迪金森虚构的《约翰中国佬的来信》（1901），以想象中的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为尺度，来批判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中庸俗的物质主义。书中的“中国佬”一改 19 世纪西方传说中丑陋怪诞的形象，复归为 18 世纪启蒙时期哲学家笔下的东方智者。在“中国佬”眼里，英国民众脱离自然，缺

^① 顾彬：《关于“异”的研究》，曹卫东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7 页。

乏灵感，丧失了生机与活力。迪金森的强烈感受是：进步可以丰富物质生活，但不一定会促进道德修养，也不必然给人类带来幸福。迪金森所描述的中国是一个自然、和谐的牧歌田园，传达着西方人对人类童年时代的向往与回忆。因此，我们说此时的中国形象相对于西方文化，意味着一种怀旧与思乡情绪，欧洲人通过想象的或实际的旅行，寻找一个温馨的“家园”、一种“前现代化阶段”的没有异化的人。

20 世纪西方新一轮的“中国热”与 17、18 世纪的相比有显著的不同。17、18 世纪西方的“中国热”热衷的是中国当时哲人治国的政治理想和一些实际的器物，20 世纪西方人更感兴趣的是中国古老的文学艺术、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17、18 世纪西方人推崇儒家思想，学习中国治理国家的成功经验和理性主义，20 世纪西方人看重的是道家智慧，寻觅中国人快乐达观的人生态度。1920 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带着对西方工业文明与前苏联革命的双重失望，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探寻一种新的希望”。在罗素的想象与描绘中，中国是一个美丽神秘的国家，那里民风醇厚、景色如画。他在游览西湖时赞叹道：“这儿简直美极了。无数诗人和皇帝已经在西湖边生活了两千年，使之增添了更多的美景。这个国家似乎比意大利更加仁慈博爱，更加古朴悠久。西湖的风景就像中国画一般，这里的人民像 18 世纪的法国人那样情趣横溢，聪明幽默，但更加活泼可爱，生活里充满了笑声，我还没有见过如此快乐的民族”。^①

与罗素先后到达中国的英国小说家毛姆，他心目中的中国在汉唐盛世，他来中国寻觅的是中国古代的荣光，昔日的绚丽，他

^① Bertrand Russell,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Vol. 3,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9, pp. 137—138.

对远古的中国充满神往，对现实与未来的中国漠视无睹。在反映毛姆中国文化观的重要作品《在中国屏风上》，我们看到在当时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上，最让毛姆感兴趣的是那暮色里消失的东方神奇与奥秘，他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汉宫魏阙，是唐风宋采，是一种凭藉自身文化优越感嗟发出的异国情调的慨叹。在他笔下，中国现代性的一面被抹去了，中国令他想起了欧洲曾经有过的田园生活，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四川平原在他的怀旧情结虚幻下，变成了美丽的莱茵河畔：“我走进它，但它不是我原先见过的中国风景。这里环绕着稻田，耸立着纪念的牌坊，坐落着奇异的庙宇，竹林深处隐隐现出农家的房舍和开在路边的客栈。榕树下，可怜的苦力放下沉重的担子歇息疲惫的肩膀。这（仿佛）是莱茵河畔，宽阔的平原在夕阳下一片金黄，像波光粼粼的莱茵河水……这是我年轻时喜欢凝视的一片原野，当时我在海德堡求学，在这座古老城市里那长满冷杉的丘陵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来到一片开阔地带。”^①

20 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审美化的中国形象是对往昔美好中国形象的重构，它省略了明显不合时宜的哲人治国等内容，强调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对的乡土精神，强调超越权威回到自我、超越社会复归自然的个性及其价值。

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有一致性，但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又有其各自的特点。就英国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来看，总体上表现出实用的倾向，即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身的需要与问题，利用中国这一他者形象来达到批评自我、对衬自身的目的。英国的中国形象，是英国自身存在的影

^① Philip Holden, *Orienting Masculinity, Orienting Nation*; W. Somerset Maugham's *Exotic Fiction*,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6, p. 71.

子，其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一种价值参照。我们在下面章节中将要谈到的许多英国作家，都是在自己的社会面临问题、自己的文化前途未卜的时候，开始塑造中国形象或着手研究中国的，这一点在那些从正面利用中国的英国作家身上尤为明显。对于那些对自己的时代深感不满或满怀焦虑的英国知识分子来说，中国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出路或退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英国文化的他者，古往今来对中国感兴趣的英国作家，通过探寻自己知识领域以外的东方世界，来激励本国人民，对衬本土的制度，丰富自己的文学想象。

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不是、也不必要等同于中国的事实，英国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是基于英国自身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经历甚至偏见，不能游离他们生活的时代。来自异域的观察者不能超越自己的文化是自然的、普遍的现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是有的英国作家真心地去理解、欣赏中国文化；有的仰慕追随一种异域情调；有的倾向于暴露批判中华文明的缺点；还有的更愿意将自己的文明与中华文明进行对照。形象和事实之间虽然不乏共性，但并不完全一致。

研究一个国家的异域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任何一种异国形象都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对异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影响和诠释情况，同时也折射出本民族的欲望、需求和心理结构。通过分析异国形象塑造中的想象成分，可以透视形象塑造者的心理动机、现实需求和深层文化结构。英国作家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是由英国人的文化心理产生出来的，烙有他们自身存在的印痕，通过分析英国作家在不同时期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英国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一个国家的异域形象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

全然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了解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变成对方的一部分，而是为了解另一个民族，必须清楚地知道这个民族的态度、观点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观点，并把他们的态度、观点同自己的相对照，相比较，避免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对方，也即在理解对方时要抛弃一切偏见。这一点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任何文化都赋予其国家、民族的人民一定的集体无意识，而置身其中的人往往觉察不到这一点。因而情形通常是：对一个民族的无知往往导致偏见，不同的评判自我与他者的标准常常带来自我之于他者的优越感。如何克服这种偏见和优越感，是我们在新的世纪进行文化交流时要十分注意的问题。

今天，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建中国文化形象，不仅要认清当前的局势，思考发展的策略，还应该清理历史遗产。在跨文化空间中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化形象和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建构作用，有助于我们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用他者所想象和记述的我们过去的形象，对照今天的现实生活，必定会加深我们对自己民族和社会的理解、省察与认识。